

▶老红军张运贵(前排左五)与老游击队员、老赤卫队员合影。  
▼张运贵(中)在延安和卫生所战友合影。



▶张运贵在  
建宁县纪念馆前  
留影。



张运贵

峥嵘岁月里的红色信仰

●建宁记者站 陈震 通讯员 刘纪茗 文/图

张运贵,又名张永贵,建宁县黄埠乡陈余村人。1931年4月参加建宁县第一支红色地方武装桂阳游击队,同年随游击队编入南(丰)广(昌)建(宁)独立团,1932年初编入红十二军,先后任副班长、班长。1932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7月调江西于都工农学校卫生所工作。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调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卫生所任班长兼党支部书记。1936年随部队抵达陕北保安县。1937年调任兵站医院(延安中央干部休养所)任护士长。1943年10月在延安响应党的“精兵简政”号召,到延安甘谷驿镇开设个人诊所行医。

新中国成立后,张运贵回到建宁,落户桂阳村翁坊桥当农民,参加土改工作组,1952年后任客坊区桂阳村党支部书记。1955年转为客坊区陈余乡工作组脱产干部。1957年服从县委县政府安排,辞去公职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72年经省委组织部、福州军区核实身份落实政策,恢复干部身份,享受老红军待遇,1983年离休。1989年12月13日病逝。

在小城建宁,记者找到了张运贵的后人,听他们讲述这位老红军的尘封故事。

“我的父亲出生于贫苦农家,没有读过书,父母早逝,从小务农,做过长工,与弟弟相依为命。当时,建宁县官僚及驻军强征粮税,桂阳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张运贵的三儿子张启平说。

张运贵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父母早逝,与弟弟相依为命。1931年,他21岁,参加了建宁第一支红军游击队。1932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跟随南广建独立团编入红十二军,赴江西作战。在频繁的战斗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救助经验和医药常识,逐渐成为一名红军卫生员。

“1934年10月,外公就跟随大部队踏上万里长征。”张运贵的外孙刘纪茗接过话茬,“离开家乡到外线作战,生死难料,当时外公不得不将唯一的亲人,不满13岁的弟弟送到陈余村一家裁缝店当学徒。”

小时候,刘纪茗常常要外公讲长征的故事,当讲到在雪山中倒下、在草地上陷入泥潭救不了的战友,在腊子口亲手杀掉驮运药品的骡马时,外公的眼中满是悲痛。后来,有人问:“长征那么艰难,你们是怎么挺过来的?”外公回答说:“还怎么挺?相信党,跟着走就是了!”

那个时候,受伤的红军战士,由于缺血少药,很难得到有效的救治。部队没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便培养部分战士学习基础的包扎、看护和救助知识,张运贵从中学到不少战场急救技能。

到达陕北后,张运贵担任中央干部休养所护士长。抗战中后期,延安边区物资困难,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号召“不要吃公家的粮食,非战斗人员下到地方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张运贵响应号召,复员到延安甘谷驿镇。他自己动手挖了两口窑洞,开办了医疗诊所,为当地百姓看病服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南方来的张医生”。

“我们当时几个孩子很不理解,就问他‘您是吃公粮的干部,为什么还要回去种田?’”父亲解释,“要相信党,不管当干部还是种田,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张启平回忆道。

“文革”期间,有人贴大字报质疑张运贵身份,甚至有人说他是逃兵。家里人很着急,他却并不担心,不去理会外界的说法,照常下地劳动,直到落实政策。孩子们问:“面对困难和‘文革’的冲击,您不怂吗?”他说:“别人说什么我管不了,但我相信党,什么也不怕。”就这样,张运贵在村里安心干他的“农民工作”,直到1989年离世。

作为中央苏区核心区,当时仅7万人口的建宁,就有7000多人参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只有4个人,张运贵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一个直到去世都在村里务农的老红军。从“相信党、跟着走”,到“相信党、回农村”,再到“相信党,什么也不怕”,张运贵用他朴实的语言和行动,诠释了一名老红军一生平凡的信仰。

“刚到村里的时候,我很担心自己工作做不好,心理压力大。”蒋文静告诉记者,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她对农村工作陌生。为了尽快适应新身份,她积极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翻阅有关资料,了解秀岭村村情,并在春节等传统节日,主动拜访外出返乡的乡贤、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及致富能手,虚心向他们请教。

“蒋书记,村里有的地方没有路灯,晚上出门很不方便,能不能帮忙改善一下?”“是啊,晚上没有路灯,我们老人只能待在家里,想去散步、找人聊聊天,都不方便!”……

蒋文静把入户走访时村民反映的问题牢记在心,多次召集村干部和村民开会讨论。在实地考察后,她根据村内主干道和人口密集地,制定了增设路灯的相关方案。积极向上争取资金20万元,推进实施乡村“亮化工程”,完成太阳能路灯安装83盏,受益农户526户1928人,切实解决了群众夜间出行难问题。

村里老年活动场所较少,无法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针对这一问题,蒋文静多方协调推动当地吴、陈两姓的祖房修缮工作,增设了泡茶室等。同时,筹集资金10万元,将村部的空闲场所进行改造,打造成老年活动室,不断丰富群众休闲文化生活。

凡人微光

沿着新建的村道走进大田县梅山镇秀岭村,原先的水泥路被柏油路代替,路面更加宽阔平坦。在道路两旁,景观石围成景观带,里面种满了各种花草和绿植。民居外墙上,彩绘画着当地名人“红军挑夫”丁刚(吴明梗)、吴文楷等老红军的长征故事,以及乡村振兴带来的新农村巨变。

“进村的路是村庄的门面,多亏了蒋文静书记积极争取资金投入建设,现在变得美观整洁。”7月2日,在秀岭村道上散步的村民吴树长讲述。蒋文静是兴业银行三明分行大田支行副行长、第六批省派驻村第一书记,2021年7月,她派驻梅山镇秀岭村,为村里的各项事业发展解决了很多难题。

丰富乡村文化设施

“刚到村里的时候,我很担心自己工作做不好,心理压力大。”蒋文静告诉记者,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她对农村工作陌生。为了尽快适应新身份,她积极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翻阅有关资料,了解秀岭村村情,并在春节等传统节日,主动拜访外出返乡的乡贤、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及致富能手,虚心向他们请教。

“蒋书记,村里有的地方没有路灯,晚上出门很不方便,能不能帮忙改善一下?”“是啊,晚上没有路灯,我们老人只能待在家里,想去散步、找人聊聊天,都不方便!”……

蒋文静把入户走访时村民反映的问题牢记在心,多次召集村干部和村民开会讨论。在实地考察后,她根据村内主干道和人口密集地,制定了增设路灯的相关方案。积极向上争取资金20万元,推进实施乡村“亮化工程”,完成太阳能路灯安装83盏,受益农户526户1928人,切实解决了群众夜间出行难问题。

村里老年活动场所较少,无法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针对这一问题,蒋文静多方协调推动当地吴、陈两姓的祖房修缮工作,增设了泡茶室等。同时,筹集资金10万元,将村部的空闲场所进行改造,打造成老年活动室,不断丰富群众休闲文化生活。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在秀岭村际下坡,村民们来来往往忙着劳作,拖拉机载着一车车农作物和肥料,沿宽阔的机耕道跑得欢。

“我们村共有16个村民小组,其中有13个村民小组的水田都集中在这个区域。”秀岭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詹建华介绍,由于水田地处下坡位置,以前通往地里的道路只有一条窄窄的泥土路,农作物从种植到收割,全靠村民肩挑手扛和双脚走路,费时费力。

2022年4月,蒋文静向兴业银行三明分行及相关部门争取了30万元资金,实施秀岭村际下坡机耕道硬化与拓宽项目,一条225米长的水泥路修建起来了,并将路面拓宽至5米,农用车和机械设备可直接开到地头,改善了村民的耕作条件。

修好了机耕道,蒋文静开始着手解决村里“用水难”“饮水难”问题。她多次往返县城,多渠道争取资金110万元,对接县水利局、水务公司,积极协调将秀岭村列入大田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二期)项目的覆盖范围,把供水管网铺设进家家户户,让村民用上干净便捷的自来水。

“驻村的时间很短,在有限的时间内为村里多做实事,这是我的工作目标。”蒋文静看着一个个项目建成,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她非常高兴,也很有成就感。

蒋文静发挥省派驻村第一书记的引领带动作用,先后为秀岭村争取到项目10个、筹措资金520余万元,推动实施秀岭村人居环境提升工程、苏区红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挡墙损毁修复工程、造溪坑汽修厂房工程等项目,极大提升了群众生产生活品质。

构建“党建+”新格局

秀岭村共有4户烟叶种植户,种植大户吴新城在2023年种烟叶净赚了15万元。

“今年我种了60多亩烤烟,农历3月底开始采摘,等采摘结束后马上进行水稻制种。”吴新城介绍,他们家采摘的烟叶已经烤了10批,烤出成品约3500公斤,每公斤收购价在30元至32元之间。搞农业投资大,种植烟叶每亩成本在4000元左右,他需要投资30万元,承担的风险比较高,一直希望村里能在资金方面多帮忙。

蒋文静把情况反映到兴业银行福建省总行,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2023年3月,兴业银行福建省总行向秀岭村捐赠产业发展资金32.5万元,村里用这笔资金以村集体入股的方式和烟农合资联营种植烟叶168亩,其中收益分成烟农占60%、村集体占40%。这样既能降低种植户的生产成本压力,又能为村财增加一笔可观的收入,并带动住在村里的农民实现就业。

兴业银行大田支行充分发挥自身金融服务等优势,全力以赴做好乡村振兴金融服务。2023年10月,兴业银行大田支行党支部和秀岭村党支部开展“红色合伙人”等系列党建活动,因地制宜拓宽思路,深入挖掘村集体资产价值,发展“村级+”合作模式。双方以乡村振兴为目标,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党建+乡村振兴”新格局,做到以党建引领发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

“我们围绕秀岭村茶叶、辣椒和火龙果等产业,先后以省级家庭农场吴树长家庭农场、福梅辣椒合作社为抓手,打造‘党员创业致富示范基地’;用好农发蔬菜专业合作社、永福柑桔专业合作社,建立‘党员+基地+合作社+农户’运营模式,带动60余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蒋文静介绍,村党支部同时发动村民将分散的土地集中流转村办合作社,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双增收”。

3年来,秀岭村通过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着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村里的资源活起来了,群众的腰包也鼓起来了。

蒋文静

真心办实事 驻村更助村

●大田记者站 叶紫妍 林生钟 实习生 刘文燕

新闻现场



“沙邑茶坊”石秤砣

清代茶社模印板

沙县发现清代“沙邑茶坊”石秤砣

●王长达 文/图

“我淘到清代‘沙邑茶坊’石秤砣。”最近,沙县收藏家江剑飞又有新发现。这个石秤砣重3.69千克,为葫芦形,顶部提环套有铁环,腹部四面刻着“沙邑茶坊”四个大字,为行楷字体。

石秤砣,古称“石权”,石秤砣耐腐蚀,经久耐用,是旧时官衙、大商家必备的衡器。江剑飞淘到的这个石秤砣来自沙县琅口。

琅口是著名的茶市。民国十七年(1928年)版《沙县志》载:“清同治初,茶市大兴,如富口、琅口、渔溪湾、管前、涌溪等乡茶庄林立。要以琅口为最盛,由同治而光绪,茶之出数有增无减。”据2017年出版的《沙县茶志》,清末,沙县是闽西北、闽中

一带茶叶贸易的重要集散地,仅琅口街市就有祥盛、同盛、金和丰、金和济等茶行13家。当时,除沙县地产茶叶,尤溪、大田、永安等闽中地区的茶叶大多运托琅口街市茶行交易。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凤岗街道水美土堡群和目前沙县最大古民居——虬江街道琅口茶丰峡村(大水湾)“孝子坊”陈氏大厝就是清代琅口茶商所建。

1983年,沙县琅口农家发现3个当年盛装茶叶的小木盒,分别有“白毛猴”“小丹桂”“水仙”,这些都是沙县出产的上等乌龙茶。

2010年,沙县博物馆从古玩藏家手上征集到一枚出自琅口地区的清代茶社模印板。这枚印板用楠木高浮雕阳纹

制作,整体扁凸条块状,通长37.5厘米,由印面、把手构成,印面刻有“和贵广记”“茶坪”“本厂监制”。这件文物是清代茶社用于印茶叶袋的印板。“茶坪”,以前属镇头(琅口),现属南霞。

清道光二年(1822)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沙县共有720余座茶园面积3万余亩,茶叶产量最高年份时接近2000吨。清同治元年(1862年),沙县乌龙茶开始出口,销量1万多箱,约150吨;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沙县红边茶出口创最高纪录,达6万箱,计1200吨。

江剑飞说,清代石秤砣、茶社模印板,是当时沙县特别是琅口茶业兴盛的实证,对于研究沙县茶业历史很有价值。